

第二章 應用正統性

前言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反省錄〉¹（1956-57年執筆，以下簡稱為〈反省錄〉）一文中進行敘述自己歷史之際，其敘述所內在的機制以及目的是甚麼呢？對此，可能有如下兩種答案。第一，敘述者對登場人物的自己，給予對過去國家而言的擁有一個正當性的角色。敘述者根據此一機制，來向現在（的讀者）主張自己曾經充分完成該角色，因此也主張自己過去是有用的。第二，敘述者吐露自己曾經做過的錯誤。敘述者根據此一機制來，爲了現在（的讀者）更好的生活，提出從自己過去的失敗得來的教訓，因此主張自己過去也是有用的。由此可說，此兩種系統的立場，都是主張過去的有用性。

本章目的擬實證如上所述的兩種系統敘述的機制與目的。因此，第一節擬概觀〈反省錄〉的內容。第二節，擬具體探討敘述者張給予登場人物張的「作爲部下，以誠意而邁進實現幻想」此一角色。由此可知，敘述者對自己過去的敘述，是爲了主張過去自己的行爲具有對過去國家的有用性。第三節，擬闡明，張的敘述存在一個機制，即應用1950年代的官方歷史觀，而試圖由現在擁有正統性的權威來保證自己敘述的妥當性。第四節，擬由於登場人物的角色內容，來發現另一敘述者的存在。根據以上的探討，本文擬闡明張學良自敘〈反省錄〉由於「應用正統性」而主張的兩種「過去有用性」。

第一節 〈西安事變反省錄〉

爲了順利進行本節以下的探討，概述本章的第一手資料〈反省錄〉的內容。〈反省錄〉全文約一萬字，文體是文言因素比較多的自敘體回憶錄。其主題是以西安事變爲主。該文執筆在1956年12月5日至1957年5月10日之期間。

〈反省錄〉主要架構有五個部分。第一，是張上蔣中正之函件的修正部分，第二，是四個段落的前言，第三，是自我介紹（1-4款），第四，是到西安事變爲止的自己心裡歷程之敘述（5-26款），第五，是由西安事變得來的反省與教訓之提示（27款）。

在第一的修正函件部分，張提出撰寫的動機。張說，原來是「關於西安事變，【張學】良本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所以無任何隻字記載存留」，但是「近念總統蔣公對良高厚，起而自奮，決心完白坦述」。另外，張說「上述領袖之參考，下垂後世之昭戒。」²，因此可知，形式上，該文的讀者，不只蔣中正而已，而且還

¹ 本文依據國史館版。引用之際、使用楊奎松所根據的款數，即楊是繼承司馬桑敦的。

² 原稿記載是，「上供 鈞座之參考，下垂后（張之字按：后係後字之略）人之昭介（張鴻銘按，

包括世人。有關此部分，定稿（國史館版，即本文使用的）與原稿（函件草稿）³之間，記載不一樣。也就是說，〈反省錄〉的撰寫動機，在原稿中明示乃受蔣中正的指示⁴，對此，在定稿中陳述為自發性的。⁵這可能是經過蔣經國修正該文的結果。

第二部分，以西安事變為主的自己前半生，張說明雖然記憶曖昧，但「盡今日所能想到者，盡量掬誠量述」，然後將西安事變定義為「禍首則為我心」。張在〈反省錄〉，根據此一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而構成一個敘述的架構，而試圖展開敘述以西安事變為中心的自己歷史。

第三部分，對於從年輕時期開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的自己，下了評價說，「『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1款）。然後，由於「厭惡內戰」（3款）與「痛恨日本對華之侵略」（4款），說明張自己所謂「幻想」的「國家必須統一，全國互相握手一致對外之觀念」（4款）的萌芽。

第四部分，提出登場人物自己的目標，即「全國統一、一致對日」。然後敘述登場人物追求此一目標的歷程。其時間範圍是，自他由歐返國（1934年），至西安事變為止的自己歷史。尤其，張敘述過去自我精神歷程，即自己曾經以忠誠態度而面對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幻想，後來由發生容共此一「一念之差」，而犯了發動西安事變之罪。

第五部分，敘述者張針對如上所述的西安事變發動之自己過去，從張自己以及中共二種方向來，下了結論，由此敘述者張提示：「西安事變最大之教訓，是在我們自己的方面」（27款）。

第二節 自我形象的設定

一、角色設定

精讀〈反省錄〉，就發現登場人物張學良被賦予一個角色。因此，我們首先探討，該角色的具體內容（二點）。其次，由此明白，張的對自己過去敘述，是現在主張過去自己對國家曾經相當有用的。

(1)幻想 根據〈反省錄〉，敘述者說「禍首則為我心」（序文部分）的這一句話，可以判明張將西安事變的原因歸咎於「我心」。「我心」曾經導致張發動西安事變，張在如此解釋自己過去之際，首先提出，他從年輕時期以來，尤其是經

介係戒字之誤。），張之宇，《口述歷史之外—張學良是怎樣一個人—》（台北：歷史智庫，2002），p.94，以及張鴻銘，〈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國史館館刊》26期（台北，1999.06），p.303。

³ 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函件草稿，在以下書籍中，已有部分披露；之宇（張之宇），《口述歷史之外—張學良是怎樣一個人—》，p.94。

⁴ 「總統鈞鑒：劉乙光同志轉下的鈞示，令良將西安事變前後事實，寫一回憶呈閱，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無似。」張之宇，〈關於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歷史月刊》（台北，1999.01），pp.67-69。

⁵ 或許蔣經國不只鑒於該〈反省錄〉的自敘、回憶錄、自白書等此些性質，而且鑒於1950年代黨國官方的需求，修正為自發執筆的記載。參見第一章第二節。

過九一八事變，「對國事問題，遂致時生幻想」(4款)。

敘述者張所說的「幻想」是，由四個因素來形成的，第一，「處事接物，但憑一己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之登場人物張對政治軍事的處理方法(1款)。第二，因「所見不同權利之爭」(27款)而「同情對方」的「化敵為友之念」(2款)。第三，基於「厭惡內戰」來的懺悔之念(3款)。第四，關於日本對華侵略之痛恨(4款)。換言之，「幻想」乃是登場人物張的政治目標，也可以說是「國家統一」(第三要素)與「一致抗日」(第四要素)之結合，這個結合則來自於「張學良的政治感覺」⁶(第一、二要素)。

敘述者敘述，登場人物的「我心」曾經強烈邁向「幻想」，即「國家統一、一致抗日」行動準則。

更加深國家必須統一，全國互相握手一致對外之觀念，凡有作為，皆向此一目標邁進，往事可考。(4款)

根據如此敘述，就可以了解，敘述者主張登場人物他自己所有的過去行為是，為了自己要邁進的目標熱烈保持誠意，而且也主張其行為均可考。由此可知，敘述者試圖對自己過去行為給與正當性。

(2)蔣中正的部下 敘述者張說明，登場人物張本來應該以自己的力量來實現自己幻想，但因為過去張「念自力不足」(4款)，無法由自己來實現，所以張乃曾經採用另外的方法，即企圖寄託於領袖來實現其幻想的方法。可以說，敘述者說明登場人物自己曾經嘗試以此方法來表現對自己幻想的誠意。

過去張學良首先寄託的是父親張作霖。敘述者如上明確提到幻想內涵之後，說「先大夫在世之時，【學良】已常有冒犯之表示」(4款)。從此可見，敘述者主張，因為登場人物的他自己曾經在張作霖麾下試圖邁進幻想的實現，所以其政軍行動是正當的。

但，之後因為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殺(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所以在登場人物張必須要將實現幻想的任務寄託於另外的領袖，後來登場人物張寄託於蔣中正，自己則成為蔣的部下(5款)。由此可見，對敘述者而言，將蔣當作一個就登場人物張而言的領袖之涵義，是作為一個可以實現登場人物張心中幻想的存在。敘述者回顧說，不但蔣是唯一的長官(5款)，而且張與蔣是如骨肉一樣。敘述者說「蔣公對【張學良】特殊優遇(…中略…)，已超過部屬關係，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25款)。敘述者對張作霖與蔣中正兩個登場人物寄託幻想的共同點，就是以「孝」或類似「孝」的「忠」作為登場人物張的盡「誠」的對象，即父親或類似父親的角色。敘述者將蔣中正與張作霖以「孝」概念來並列，由此對蔣給予一個作為登場人物張的領袖之正當性。

⁶ 此概念最初使用的是王光逵。漱流(王光逵)〈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司馬桑敦(王光逵)，《張學良評傳》(台北：傳記文學，1989)，pp.339-340。以下簡稱，漱流〈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而且引用之際只記頁數。

總之，敘述者將自己的政治生涯（至西安事變的前半生）設定為邁進實現幻想的「正當」歷史，並不是設定為企圖擴大自己勢力的「軍閥」歷史。

二、具有正當性的四種過去實踐形態

如上所述，敘述者所敘述的登場人物張學良，其角色（任務）是，由二大因素而形成的，即第一是追究實現「國家統一、一致抗日」此一幻想，第二是因而自己成為領袖的部下。敘述者的意圖，則是主張自己曾經對此任務表示相當的誠意。可是，因為登場人物的角色是由二種因素而構成的，所以登場人物向兩種任務所表示的誠意之比重，是在每個場面不一樣。因此，本文擬首先注意到誠意此一概念的涵義變化，而整理張的敘述內容，然後由此闡明，敘述者當進行敘述自己歷史之際，其目的是，為了主張自己過去行為曾經對國家發揮有用性的。

(1)剿共：部下>幻想 敘述者敘述，他曾經參與的所有政軍活動，是爲了實現「國家統一、一致抗日」此一幻想。他參與過的剿匪戰也不例外。他談到，登場人物張自歐洲歸國（1934年1月）之後，他本來希望在蔣中正領導之下邁進於實現幻想。但，蔣指示剿討土匪或共匪⁷，「任【張學良】選擇時，實皆非所願，但由於情感及服務上的關係，毅然表示，願擔任比較困難之剿共任務」（6款）。由此可知，敘述者的敘述邏輯是，登場人物張爲了後來確實由領袖來實現張的幻想，優先由於骨肉（情感上）與「長官—部下」（服務上）的關係，來參與剿匪戰。

在此，敘述者敘述自己曾經參與剿共戰的歷史，其重點不在表現爲了實現幻想的誠意，而在表明身爲蔣的部下的誠意。

(2)容共：部下<幻想 登場人物張雖然服從蔣而參與剿匪戰，但是兩次的失望（6款），頓挫張的實現幻想之希望。第二次失望的「陝西剿匪失利」尤其是「兩次慘敗⁸使良心中倍增痛苦」（9款）。他加深自己對內戰厭惡之念，而且，「對共匪戰鬥力，不爲輕視，遂觸動『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焉」（9款）。此「和平」辦法是，正如敘述者說明「一如昔年，在其他國內戰爭中所經歷者然」（9款），而且它確實是由於「今日可以爲敵，明日在某一目標下，又可爲友」（27款）之「張學良的政治感覺」來產生的。敘述者說明，他承認「兩次慘敗」成爲一個過去他抱著容共思想之萌芽。接著敘述者說明，「而心秘藏所圖者，被他人誤解則不計」（10款），因爲實際上「良對共黨殊少研究和認識」（10款）。敘述者吐露，在「良內生煩悶之心，外聽侮辱之言」（10款）之情況之下，曾經使過去自己培養容共思想的是，過去他自己對中央政府（國民黨）的認識。敘述者說，他自己曾

⁷ 原文是「三省邊區共匪」（6款），所以恐怕是張學良是在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就任期間（1934.03.01-1935.03.01）的。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pp.670-810。該書以下簡稱《張學良年譜》。

⁸ 1935年10月，東北軍第六七軍一一〇師（師長何立中）與中共的工農紅軍紅一五軍（徐海東指揮），在甘泉嶗山交戰。1935年11月，東北軍第五七軍一〇九師（師長牛元峰）與中共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指揮），在直羅鎮交戰。《張學良年譜》，pp.909-937。

經赴南京參加國民政府五全大會⁹，其後，他在南京發現了中國中央不但不熱心抗日，而且缺少「公」的觀念，此「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8款)。

敘述者說，該時「共匪表示，不敵視東北軍之誠意」(14款)，其後在中共的有積極也有誠意的行動之下，張周會談終於實現了，張敬佩了周恩來(16款)，而且深信容共思想。對此，敘述者說明其理由如下：「既然彼等聲言為國，聲言抗日，何不推誠相見，(…中略…)今其自來，如能化敵為友，豈不正合余之心意」(14款)，因此他相信了「可實現良一往心中之諸幻想」(14款)。

但是，對登場人物張而言，實現幻想之主體則在於蔣中正，所以張一定「竭力進言，以謀實現」(16款)。可是，蔣則「痛斥共匪為大漢奸」(17款)，絕對不允許容共，因而「良欲向蔣公陳請者，至是則絕望矣」(7款)。

敘述者批評過去的中國政界。敘述者指出，它們在1930年代中期當時曾對張與東北軍做不正確的評價，以致張的幻想被阻礙無法實現，因此張「加深必須實現良之幻想¹⁰」，而且「自認此念純潔，遂力下決心，甘願犧牲一切，不達目的不止」(20款)。

在此，張敘述自己過去之際，登場人物的誠意重點放在實現自己幻想的，而不是放在作為蔣的部下。有關蔣的部下此一角色，敘述者以向蔣「進言」的記載而勉強表達登場人物張的誠意。而且由此可知，敘述者試圖將自己曾經保持容共思想此一論點，放在「為了實現幻想」的過去自己行動準則當中，來勉強定位而進行說明。但是，作者張是使用大量字數而說明的，從此可以推測，或許作者的意圖不容易實現。另外，如下可知(本章第四節)，這些作者的勉強定位的意圖，引起破壞張的〈反省錄〉此一自敘的整個邏輯一貫性。

(3)兵諫：先只對幻想，後恢復部下 敘述者針對西安事變即將爆發之前當時情況來敘述：過去張雖然為了實現幻想而以誠意向蔣諫言，但是張與蔣完全對立，終於導致「痛恨之，有若仇讎」(26款)，所以，張乃「同楊虎城計議，遂決行強諫劫持之謀」(22款)。敘述者表示其曾經發動事變的直接理由，說：「蔣公數次召集將領會議，皆無良同楊虎城列席，(…中略…)而良則有甚於疑懼者，是思蔣公對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視矣」(22款)。敘述者在此表示，過去自己因為被隔離於實現幻想的主體蔣中正，所以害怕不能實現幻想，終於發動事變。在此敘述者只有敘述為了實現幻想所表現的誠意。

但是，登場人物張是另外也需要表現其作為一個蔣的部下的角色之誠意，因此敘述者表示兩個「歷史事實」，這是猶如為了補寫剛才的在事變發動場面沒有表現。敘述者首先談到事變與中共的關係。他說，「此時對於共黨方面並未徵詢商議」(22款)，他一開始對事變發動與中共之直接關係做了全面否定。他說，事變發動之後，因為「痛部屬之無能，驚楊部之無規律，(…中略…)彷徨束手，問策無人」，

⁹ 自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張學良年譜》，pp.929-934。

¹⁰ 登場人物張具體提出的幻想之內涵是，中央政府革新、容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所以「立即電請周恩來到西安，共商決策」(23款)。「周等到西安時，告知良彼等【中共】初聞西安之變，深為驚訝」(22款)，他再一次強調中共與事變的發動毫無關係。在此，敘述者強烈強調，登場人物張要實現的「國家統一、一致抗日」這個幻想，其主體是在於蔣中正，並不在於中共，換言之，敘述者主張一定不是自己曾經將其實現幻想之主體，從蔣中正轉移到中共。¹¹

接著，張進行說明另一事實。對敘述者而言，登場人物的幻想，是必須要由蔣中正來實現的，因而容共只是為了實現其幻想的一個過程而已。敘述者說：「良該當時公開之言論，尊崇蔣公仍為吾等之領袖也」(22款)。又說：「當事變之後，良曾召集西北剿匪總部全體同人訓話，及在西京公園民眾大會上之講演¹²，皆曾有紀錄可考」(22款)。敘述者要強調的事是，事變前後登場人物張的對蔣尊敬情感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在發動西安事變的整個場面，敘述者主張，過去自己對實現幻想的任務所表示之誠意就是一慣性的；另外，他過去對部下的任務所表示之誠意，雖然只有一次出現沒有敘述，但是馬上再次開始敘述。

(4)離陝：部下＝幻想 放蔣之理由，敘述者說明是因為防止內戰（西北大聯合與南京中央的內戰）以及重新確認蔣的抗日意志（26款）。然後敘述者開始說明自己與蔣的關係，即「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讎；愛護期許，則如骨肉，真是前無之事」(26款)，再一次由「骨肉關係」而強調當時只有蔣曾經具備可以代張實現幻想之正當性。但是，這並不保證蔣承諾容共。本來容共是張為了實現幻想的一個重要過程，可是，在〈反省錄〉的對發動事變之後的敘述當中，敘述者卻完全沒有談到容共問題。反正在此敘述者將登場人物的自己角色重新定位為，為了實現幻想就一定作為蔣的部下。

要之，敘述者由於回憶其過去而主張說，過去自己對實現幻想（國家統一、一致抗日）相當誠實，因而可說自己曾經對國家（中國）表現誠意。本來登場人物張自己的角色，是作為蔣的部下而邁進實現幻想，因此他放棄蔣的部下之角色來發動的西安事變，就是自己的錯誤。但換言之就可說，敘述者主張，西安事變的發動就是，自己曾經在蔣的主體下試圖實現幻想之結果。

張如此敘述自己的過去，因而對自己過去行為，加以正當性，然後向現在（的讀者）主張自己過去的對過去國家之有用性。此一主張就是，1950年代後半期台灣所存在的張學良在〈反省錄〉中對自己過去之敘述目的。

¹¹ 有關西安事變與中共的歷史事實之關係，請參考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圖書，1995）。該書是，根據中共以及俄國檔案資料，來證實事變前張學良有了與中共的密切關係，尤其是證實張學良嘗試申請中國共產黨入黨之歷史事實。

¹² 〈對總部全體職員的講話（1936年12月13日下午5時）〉，《解放日報》（西安，1936.12.14）轉引自周毅、張友坤、張忠發（主編），《張學良文集》〔下〕（香港：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pp.448-452。〈在西安市民大會上的講演詞（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報》（西安，1936.12.17）轉引自《張學良文集》〔下〕，pp.458-460。

第三節 對正統歷史觀的對應

經過前一節的討論，我們已經得知張對自己歷史的敘述之機制以及目的。張首先說明，自己所有過去都在領袖的領導之下，邁進實現「國家統一、一致抗日」此一幻想。然後張使用此一機制，來主張自己過去行為的正當性，換言之，主張自己曾經對國家表現的有用性。這是作者張要敘述的目的。

那麼，我們讀者為甚麼不得不表示了解張所展開的對自己歷史之說明，其理由在何處呢？本節擬解決此一疑問，因此張的敘述與當時的正統敘述（黨國體制下的官方歷史解釋）進行比較而討論。此際，首先將正統歷史敘述，尤其是限定於一套可以說是對張的敘述給予影響之正統敘述，加以定義。其次，探討在張自敘中張自己的歷史敘述與正統的歷史敘述所接觸部分。然後由此提出，張是應用正統性來敘述自己過去此一特色。經過以上的討論，本節擬證明，因為張的自敘應用正統歷史敘述來撰寫的，所以我們讀者除非否定正統歷史敘述的架構本身，否則不得不感覺他的敘述之妥當性，而且不得不表示了解。

一、在 1950 年代的對 1930 年代正統認識

關於 1950 年代權威（中華民國、國民黨）所定義的對 1930 年代解釋，筆者在此只提出其特色，即在軍閥所混戰的 1920 年代中國，國民黨就接受國民願意國家統一的一般意志（general will），1928 年北伐成功，中國終於得到統一。但是，1930 年代中國，還擁有內憂（中共叛亂，背後有蘇聯）與外患（日本侵略）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根本性的國家統一以及國家建設。針對這些國家目標率領國民的就是國民黨、國民政府，也就是其最高領袖蔣中正。

1950 年代的對 1930 年代正統認識，可以說是，由於 1950 年代黨國的權威來，幾乎無條件地被強制承認而且認同在 1930 年代的以黨治國、以黨領政這些過去之合法性的。該正統認識似乎「正史」。

二、張敘述的妥當性強化

(1) 角色（幻想 + 部下） 敘述者張學良提出的幻想，是登場人物即過去他自己的政治目標。幻想的內涵是，「國家統一、一致抗日」。換言之，幻想是，由 1956 年的張來重新設定的過去張生涯中之「真理」目標。此際，幻想的「真理性」基礎，是由 1950 年代官方歷史觀的權威來奠定。從 1950 年代官方歷史觀來看的 1930 年代，也就是以「國家統一、一致抗日」為真理的時代。

敘述者說，過去自己以誠意來面臨其幻想，但自己力量不夠，所以將實現幻想的任務寄託於領袖，自己則在領袖領導之下，以誠意而服從。對登場人物張而言，蔣是作為一個實現幻想的最好領袖。其實，張自歐洲回來，「過香港之時，胡

漢民先生勸阻暫止港，陳濟棠派人歡迎入粵；良一概拒絕」(5款)。敘述者主張，登場人物張可以寄託實現幻想的人物(即領袖)，當時除了蔣中正之外並無其他適當人選。敘述者的這些說明，是適合於由1950年代官方歷史觀來重新設定的1930年代「正當」時代潮流。

張是依據官方歷史的正統性，來對於他在張作霖與蔣中正領導之下進行的所有政軍活動，給與「爲了實現幻想」此一正當性。換言之，張主張爲了實現幻想，張曾經將實現幻想的「主體性」寄託於張作霖與蔣中正。所以，張主張，自己過去在張作霖的領導之下，雖然向張作霖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諫言，但不得不參與內戰，而且曾經在蔣中正的領導之下，「由於情感及服從上的關係，毅然表示，願擔任比較困難之剿共任務」(6款)。

(2)剿共 蔣是張的領袖。敘述者對此說明，「良自念歸國以來，一秉忠誠；處處爲國家，爲領袖。從未計及個人利害」(19款)。他如此說，就表示他肯定1930年代蔣在中國當政之合法性，同時亦肯定張自己在1930年代的政軍行爲之正當性。敘述者說明，他曾經服從安內攘外政策，參加剿匪戰的理由，是因爲，「調用東北軍，多由於蔣公的命令」(6款)，換言之，也主張他自己過去沒有因私人理由而率領東北軍。由此可見，他利用1950年代官方的對1930年代史觀(以黨治國，安內攘外)之正統性來保證自己過去行爲的正當性。

(3)容共 敘述者說明，他曾經由於在中共處認識至誠而思考容納中共，而且曾經以爲容共關聯到自己幻想的實現。換言之，他主張，他過去相信容共應當聯繫到以「國家統一、一致抗日」爲「正當」的正統1930年代國家目標。

所以，敘述者提示詳細例子來說明，「良認爲中央對共匪有可容納之意」(12款)。他在這裡委婉表示，曾經主張容共的不只是他而已，中央亦曾經試圖容共。

¹³ 其實張是敘述容共部分之際，先提出過去中央具有容共的意圖之論述，然後試圖保證自己過去的容共主張。

(4)蔣中正蒙難 敘述者敘述至於事變最終的場面，即「蔣公離陝問題」之際，登場人物張當時對楊虎城強調說明，「我等既已看過蔣公『日記』，確知蔣公有抗日之決心，並已應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見，提出中央會議討論¹⁴」(26款)。換言之，敘述者說明，事變當時張確認蔣是張的抗日領導者，因此張陪蔣回寧。另外，敘述者主張，「而蔣公又從不假以詞色，總秉『成仁』之決心，責良無論任何堂皇請求，在威脅情形之下，決不應許，亦不同良等商討」(22款)。歷史上的張學良是否看過蔣的日記¹⁵，還有，蔣在事變中是否沒有一切政治交涉，這些問題連今日

¹³ 有趣的是，有關中央試圖容共的部分，當年刪去而未發表的。後來在1999年國史館版〈反省錄〉當中才公開的。這恐怕是戰後國民黨政權願意完全否定國民黨曾經保持容共的此些歷史解釋。

¹⁴ 《西安半月記》(12月14日部分)稱：在西安，張要求蔣說，張在中央會議提出而且討論即時抗日案，蔣則首先明言自己後來在當場一定提出反對意見，然後允許張的要求。張對此說，如此則無意義。

¹⁵ 關於張是否因閱讀蔣的日記而感動，參見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有關內心抗日神話的部分。

也就是討論中的。張則是因為須要維持自己歷史解釋的邏輯妥當性（即身為部下而實現幻想），所以張適用正統的歷史解釋，或不得不適用它。

(5)正意誠心 敘述者使用正統性的此一行爲，從如下的記載也可以判明。他說，人在「憂患、忿恨、好樂、恐懼」（27款）¹⁶的情況下，無法「誠意正心」，這就是引自《大學》的意識描述。張明顯地意識到儒學經典，尤其宋明理學所重視的四書。¹⁷他雖然完全沒有接觸宋明理學（陽明學）的基本思想（如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叛逆等），但只有利用陽明學的此一正統性來，亦企圖補強並保證自己主張的妥當性。張不但使用國民黨本身的正統性，而且使用蔣中正所提倡的陽明學此另一正統性。從此可說在敘述者選擇正統性的行爲中，的確存在他的意志。

如上所述，張的歷史敘述與「黨國正史」是相當密切，而且敘述者張是利用「黨國正史」補強其主張的妥當性。因此如果作者要否定〈反省錄〉的邏輯，即蔣的領導之下實現幻想此一邏輯，就關係到否定作者自己過去（歷史）的合法性，所以不可能。而且，否定中華民國的邏輯，是關繫到否定中華民國的合法性，這在1950年代台灣的情況不允許張如此做。相反的，張要選擇的則是，自己歷史的敘述與「黨國正史」不發生衝突的方法，即，張是由於應用正統性，來試圖保證自己過去行爲的正當性以及自己現在主張的妥當性。爲了這些自己目的，主動意圖利用既存的正統架構。因爲存在這些意圖，所以我們將作者張的思想可稱爲「應用正統性」。

第四節 成功的過去或失敗的過去

經過以上的討論，有關張的自己歷史敘述，我們已經明白了，即第一是，敘述者對登場人物的自己，加以就過去國家而言有用的某一具有正當性角色，第二是須要向現在（的讀者）主張，自己曾經盡誠充分追究該角色。然後敘述者敘述的妥當性是，尋求同一時代（1950年代）權威擁有的正統性來保證。但是，張在

對此肯定的是(1)蔣中正，《西安半月記》（南京：正中書局，1937），p.44。(2)蔣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南京：正中書局，1937），p.51。(3)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口述），澤勒〔Earl Albert Selle〕（記錄），《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1994），p.227。另外，否定的是(1)郭冠英，《張學良側寫》（台北：傳記文學，1992）。(2)郭冠英，〈北投張學良家的談話—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上）〉，《聯合報》（台北，2001.07.07），聯合副刊，37版。

¹⁶ 《大學》原文為「忿懣、恐懼、好樂、憂患」。

¹⁷ 1950年代，張被軟禁在台灣，他因蔣的影響而研究儒學（宋明理學），尤其是陽明學。宋明理學主張，追究「誠」的話，任何人都可以成爲聖人。台中的東海大學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保存之張學良藏書儒學線裝本，從這些儒學經典的存在也可以接近了解到張學良的內心世界。或許可以推測該學問對張的影響。有關東海大學的藏書詳細內容，參照黃文興，〈從藏書題款看張學良幽禁期間的讀書生活——兼記張學良捐贈藏書東海大學圖書館〉，《傳記文學》，63卷5期（台北，1993.11），pp.77-86。

〈反省錄〉中對自己過去的敘述邏輯並不是只有一種。因此，本節擬首先明確另一邏輯，其次指出由兩種邏輯而形成之張的整個敘述所包含的矛盾。

一、敘述的兩種立場

我們須要注意的是，容共思想乃罪之所在。敘述者強調說「良不能委罪於他人，雖然策出於他人，實有動於我心」（12 款）。敘述者的如此敘述相當悲觀的，而且此敘述者與所謂邁進幻想的敘述者，其主張目的好像是相反的，即前者否定自己過去，後者則肯定自己過去。反正此敘述者至少表面上歸罪於我心，而不是在於中央政府（國民黨）或中共。可是另一方面，所謂邁進幻象的敘述者，屢屢強調當時中央政府的腐敗以及當時中共的誠意，說：「殊不知中國官場，則大謬不然者也」（19 款），或許也可以說，罪就在於讓過去張改變認識的國共兩黨本身。反正，作者所以曖昧其真意，也許是因為他在 1950 年代被軟禁之故。但該因素並非唯一因素。主要因素是爲了維持〈反省錄〉的邏輯。換言之，敘述者由於提出「禍首則爲我心」，而從自己的「心」之變遷來嘗試說明到西安事變爲止的心裡歷程。由此可以了解，至少表面上，對敘述者而言，其罪首先在於如此認識到中共與中央的自己心裡。作者將其罪歸之於自己的認識當中。

敘述者敘述，他曾經從中共那裡認識到「至誠」，反之，從中央（國民黨）那裡則認識了「不誠」。在此須要注意的是，對登場人物張的國事（幻想）而言，當時中共是否至誠，對此，敘述者沒有說當時中共是至誠。敘述者現在（1956 年）就說，在過去（1936 年）「我心」當中，他曾經認爲中共至誠。因而，他現在說：「殊不料良當年認爲愛國抗日之共產黨人，（…中略…）誠如蔣公早年所言『頭等漢奸』也」，因而他現在表現「羞愧自憾無已」之感情（14 款），而且反省自己過去的錯誤。這就是敘述者從 1956 年現在來重新定義的對 1936 年中共歷史評價，而不是張在 1936 年事變當時的對中共之認識本身。同樣的，張對中央認識也一樣，中央爲「不誠」，這是敘述者從現在回顧而說的他在 1930 年代後半期過去的對中央認識，而不是張在 1930 年代當年的對中央認識本身。敘述者的這些說明之機制，是將當時自己對國共認識當做問題，而不是將當時國共兩黨本身當做問題。如此，張將自己的歷史敘述，不但以不對立於現在（1956 年）「黨國正史」觀點之方式，而且以依靠此一擁有正統性的觀點之方式來定義的。因此我們將此敘述者稱爲正統敘述者。

總之我們須要注意的是，在〈反省錄〉此一自敘中，敘述者敘述過去之際，有兩種立場來進行的。一方面是敘述者在主張實現幻想的正當誠意此一脈絡上，敘述過去。因此將之稱爲正當敘述者。這是經過本章的討論已經明白的張敘述的主要立場。另一方面是張在反省自己錯誤此一脈絡上，敘述過去。因此將之稱爲正統敘述者。那麼，此兩種敘述的立場是根據甚麼目的來各自展開的呢。如下繼續探討。

二、一念之差

兩種敘述者到底有如何關係呢？對於發動西安事變之犯罪，正統敘述者下了一個結論，他說：「其罪固在良之一身（…中略…）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個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24 款）。正統敘述者還是將發動事變的原因，歸咎於他自己的心。他確定，其錯誤的根本就在於自己心裡發生的「一念之差」，即他認為中共問題可使用「和平」辦法來解決的「一念之差」。不過，他所說的「一念之差」到底是為何發生的呢？為了闡明其原因，敘述者繼續分析他的錯誤。

正統敘述者提出「一念之差」這個錯誤所產生的原因有二個。一則，他省察到他本身的性格以及他的個人情況，而說：「滿腹憂患，膽大妄為，固執己見，不計利害」；二則，他說：「對共黨無深刻之研究，無正確之認識」（27 款）。他下了結論而說：「殊不知，前提已錯比，而推斷自然大錯而特錯矣。（…中略…）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義，自用自專；又未能趨就老成，才會釀成西安之變」（27 款）。換言之，他吐露：在無法沉思判斷的個人性格以及個人情況之下，雖然自己認識中共不多，但卻突發主張容共。

「一念之差」在〈反省錄〉整個文脈中，與幻想加以定位如下；張本來是對實現幻想，非常至誠，但是在「憂患、忿恨、好樂、恐懼」（27 款）的情況下，因「不審遠近厚薄之一義」（2 款），而發生「一念之差」，「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12 款）。張終於將「張的政治感覺」誤用於認識不深的中共，而且提倡停止內戰實施容共一致抗日，最後為了讓蔣實行之，遂發動事變。這是，張在〈反省錄〉中展開的正統立場的敘述脈絡。

正統敘述者針對自己前半生，反省而說，「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為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24 款）。中共就是，「使【張學良】認為同道好友，自墮其彀中，毫不自覺」（27 款）。他如此反省之後，主張說：「今日反共鬥爭，必須使大家確實認清共匪之真面目，自發鬥爭。（…中略…）所以良覺得西安事變最大之教訓，是在我們自己的方面，世界上並無強敵，乃係自弱耳」（27 款）。在此，正統敘述者將西安事變此一失敗經驗，作為一個教訓，提出給現在國家為了可以利用。這是敘述者從正統立場來要展開的敘述目的。因此可說，在此目的之下，敘述者對自己整個過去，加以失敗的意義。

可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本來係張學良自己之「理想」（即他自己所說的「幻想」）。在張希求邁向實現自己「理想」的政治生涯上，雖然發生「一念之差」，但張曾經始終堅持以「至誠」面對自己幻想。因此正當敘述者非常強調主張自己過去曾經發揮的有用性。這也就是敘述者在〈反省錄〉中從正當立場來要

敘述自己過去的目的。因此可言，在此目的之下，敘述者對自己整個過去，加以成功的意義。

此兩種立場的敘述過去，哪個是作者自己的「真意」所反映的呢。張學良所說的幻想，原來是他的理想呢，或者，還是他的幻想呢？哪個是作者透過〈反省錄〉試圖告訴讀者的呢？對此問題，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一書的「西安事變」部分，以及王光逖〈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一文，二者曾經提出了有趣的觀點。蔣中正是根據其對現在張學良的興趣（企圖政治上使用張的此一興趣）來，注視到張的正統立場的敘述，另外，王光逖是根據其對過去張學良的興趣（歷史學上的興趣）來，注視到張的正當立場的敘述。

蔣中正說，張學良「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中略…）因之，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一問題上，雖已成爲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儘可爲良友」。¹⁸ 蔣根據張的自敘，了解張發動西安事變之原因在於張的政治觀念。蔣了解張應該要反省過去的失敗，因而蔣視爲張認爲張的政治觀念是偶然性、否定性的。蔣確實是爲了證明共產黨的武裝暴力是「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¹⁹才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對蔣而言，張學良自敘是，須要吐露自己不知不覺地陷入中共陰謀因而反省的。由此可說蔣支持，張敘述的正統立場。因此就蔣的觀點而言，〈反省錄〉的重點是正統敘述者張學良所提出的內容，而且張的整個過去是失敗的。

另外，王光逖對蔣的觀點提出批評。王光逖說，蔣漏掉了「所見不同權利之爭」（27款）之字句，該字句是在〈反省錄〉中張學良的重要字句。王光逖主張，「張學良把現代中國的一些內戰，統視爲『所見不同權利之爭』的」。而且王說明，因爲「所見不同權利之爭」所以可以「化敵爲友」（2款）。張學良的這種政治觀念，王光逖將之稱爲「張學良的政治感覺」，而且王光逖根據張的身份與經歷，主張該政治感覺「其實並非偶然」。²⁰王光逖試圖的是，借用歷史事實，來重新建構與在〈反省錄〉裡所記述絲毫不差的到西安事變爲止之張學良前半生。雖然這是「學術違反」²¹，但是他要嘗試以這些動機來將「張的政治感覺」視爲肯定的，而且在歷史上是確實存在的。因此可說，就王的觀點而言，〈反省錄〉的重點是正當敘述者張學良所提出的內容，而且張的整個過去是成功的。

那麼，根據蔣中正與王光逖的兩種相反見解，我們如何判斷，作者張學良的

¹⁸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pp.78-79。

¹⁹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p.7。

²⁰ 激流〈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pp.339-340。

²¹ 因此，王光逖提出的觀點，對張學良自敘本身的研究而言，還是不正確的。的確可以說，王光逖並未站在「黨國正史」的觀點，相對的，他是站在張學良的觀點，來嘗試探討張的思想。但是，它的結果似仍不成功，他是被張自敘的架構控制的。王光逖的主要研究，並不在張在〈反省錄〉中所表現的思想。因爲王光逖完全沒有探討，在〈反省錄〉這個理論上已經完結的小宇宙中，「張的政治感覺」與張蔣關係，或者它與張學良—中共關係，或者它與張的厭惡內戰，或者它與張的抗日意識，到底有怎樣的內在邏輯關聯呢。

真意在幻想或者理想呢，換言之，失敗的過去或者成功的過去呢？筆者認為對此一問題不可能解決，而且不需要解決。雖然就作者層次而言無法提出結論，但是就敘述者層次而言則可以提出結論。即實際上，張對過去的敘述之架構，擁有兩種邏輯，而且這兩種敘述者是混淆的。我們須要承認此一混淆狀況。正當敘述者也好，正統敘述者也好，無法否定的是，兩個都應用官方歷史的正統性（雖然尤其與其後者說是應用不如說是依靠），來主張自己過去的有用性。而且，將兩種敘述者的混合程度，經過張學良的其他自敘互相比較之後，我們才得知〈反省錄〉此一資料，在張對過去的敘述之脈絡上所佔的位置。